

## 我读书中的那些“一”

● 马蔺荣

下我填写好外借卡上所有的空格,读懂并记住了借阅的规章制度后,郑重地在外借书架上选中了我神往已久如雷贯耳的《红岩》。当时在外借室找书,除了在装着检索卡的抽屉里能找到书名对应的外借图书编号外,就是借书人可以直接在书架的玻璃隔断中间留有一条缝中推出要借阅的书。当我推出《红岩》,管理员为我办好手续后,我高兴地知道这本书属于我看的时间竟有两个星期。

后来我在徐汇区少儿图书室先后借阅了《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逐鹿中原》《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苦菜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许许多多的中外革命书籍,也第一次阅读了《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第一次看到了《唐诗三百首》。

我买的第一套《辞海》,已经是1976年3月6日了,那天闵行区新华书店到我工作的吴泾化工厂一食堂设摊卖“学理论、学哲学”书,我当时一下子就选中了位于书摊最角落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2.75元的《辞海》(修订稿)(生物分册)。从第一本《生物分册》买下后,我居然用了四年半多的时间骑自行车1300多公里到闵行书店分27次才买齐这整套《辞海》(修订稿)。

就在今年4月23日,我因为收藏的一本离休干部老奚在我由老干部科长岗位调任新职务前送我的一本七大党章精装本,第一次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在上海图书城由新民晚报社、新华传媒主办的市民文化客厅第十九期“4·23世界读书日”——“寻找红色记

## 桂誉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忆 传承百年荣光暨《百份红色记忆展》开幕”特别活动,并走上了主席台。

在活动中,我第一次和东方卫视主持人何卿进行了对话,针对她关于我如何读红色革命书籍的问题,我不仅谈了自己从小爱读红色革命小说的经过,也介绍了这本珍贵的《党章》得来的经过。我还介绍读书给自己带来的收获,特别是读书对自己工作生活和信仰志气、气节方面的影响。当我说起自己对五十多年前看的《红岩》里许多情节还历历在目、甚至尚能背诵书中革命志士的诗篇时,何卿当即要我背一段。于是我激情满怀全文背诵了成岗的《我的自白书》。背诵结束,全场为我鼓掌!

现在,我家中的书大概和上海绝大部分家庭一样存有了不下千本的各式书籍。但是,因为我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眼睛不行了,精力也有限,因此过去年轻时一天能看一大本书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我在看了每天必看的报纸和电视新闻外,还坚持每天看一段、甚至看一页书,每年至少看一本完整的好书。因为我觉得读书的好处岂止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 路

● 崔立

她是路盲,出了名的。有时,就在家附近的马路,她走着走着,居然也会迷路。每一次,她都会打电话,大致说个位置,让他来接。他总是既好气又好笑,还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了你,看你怎么办?她也笑,说,凉拌呗。

只是句玩笑话,却在某一天成了真。

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被抓个正着。她是眼中掺不进沙子的人。没有面红耳赤的吵闹,没有石破天惊的打砸,她显得很平静,平静到她只会说两个字,离婚!他苦笑,知道她是外柔内刚的人,轻易不说什么,一旦说出来就是她最后的决定。

那一天,去民政局办离婚是她带的路。民政局其实并不好找,记得当初他们去办结婚证时,是他带的路,像他这么一个路路熟,也是费了好大周折才到了那里。真的是很不好找啊。而且办结婚,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她不可能还这么记忆犹新。他因此很意外,她居然能认识。

站在民政局的门口,她看出了他心头的疑惑,淡淡地说,未来的路要我一个人走了,我不认识路怎么走?然后,没再说什么,就径直走了进去。

是啊。未来的路她将一个人走。有他在的时候,他就是她的路。而现在,她只有自己这一条路了。



■ 村庄(摄影)

计小江

于是,《新青年》在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后即与群益书社分手,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另起炉灶,成立新青年社,自办《新青年》,而新青年社总发行所就选址在金陵东路279号。

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成立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出版,其业务重担由陈独秀的安徽老乡苏新甫一肩挑起,其编辑人员现在看来全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包括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袁振英等。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而《新青年》无疑是其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在主发《新青年》杂志的同时,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劳动运动史》等,更创办

了以产业工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劳动界》。这些书籍和刊物使上海成了新思想、新理论的主要策源地和传播地,在全国起到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一时间,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全国上下形成燎原之势。

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未有严格的组织行为对新青年社保驾护航。虽然陈独秀在为新青年社总发行所选址时已有意识地选择了警力相对薄弱的法租界,但不知是欠缺斗争经验还是对上海不熟悉,他竟选在了法租界总警局的对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吃惊的是,新青年社总发行所竟然不是一个秘密机构,而是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一度热闹非凡,青年学生和工人经常光顾。

其实,法租界在1914年急速扩张时就已向袁世凯承诺会在革命党人的问题上全力配合北京政府。因

此,当法租界当局发现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这个激进机构时,立刻毫不犹豫加以干涉。

1921年2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六号排印时,金陵东路279号门口和吉利里弄口突然布满了法租界的警探,他们搜走了机器上在印的全部稿件,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也被禁止印制和出售。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被查封。至此,《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光辉岁月被迫中止。

《新青年》杂志迁回上海,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革命向进一步发展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为其政治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顺理成章,已成为大势之趋。

所幸的是,金陵东路279号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旧址历经百年,依然留存至今。(下)

## 吉利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旧址

##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